

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

——以《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 本文研究了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后最早的4个中文刻本, 尤其是其中之一的《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一书的结构、著者、成书和术语等问题, 并首次公布了书中所附的西班牙文献的翻译。

关键词: 菲律宾; 中文刻本; 西班牙来华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0)03-0073-08

近年来, 学术界对葡萄牙人东来后所引起的中西文化交流多有研究, 但对西班牙人东来后所引起的中西文化研究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 但相对而言薄弱一些, 尤其对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所刻印的中文书籍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本文仅就西班牙人早期在菲律宾的重要早期中文刻本做一初步探讨^①, 求教各位方家。

收稿日期: 2010-06-07

作者简介: 张西平, 男, 河南温县人,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方豪《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明万历年间马尼拉刊印之汉籍》, 见《方豪六十自选稿》下册, 台湾学生书局, 1969年, 第1487-1517页、第1581-1524页; 《明末马尼拉华侨教会之特殊用语与习俗: ‘新刊僚氏正教便览’与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 两书之综合研究》、《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吕宋明刻‘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之研究》, 见《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 台湾学生书局, 1974年, 第437-453页、第455-470页、第471-785页; Carl s Quirino 著: 《‘无极天主教真传之正辨’考》, 汪雁秋译, 台湾《大陆杂志》第26卷第8期, 1963年4月; 裴化行 (Henri Benard), “Les origines chinoises de l’imprimerie aux Philippines”, *Monumenta Serica* 1942, V. 7, pp 312-14; 龙彼德 (P.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V. 12 part 1, 1966 New Series; 戚志芬: 《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 《文献》1988年第4期, 第544-556页;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下,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第671-699页; 潘吉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419-423页; 多明戈·科罗纳德: 《西班牙神父在远东: 高母羨及其著作〈实录〉》, 周振鹤、徐文堪译, 载黄时鉴主编《东西文化交流论谭》第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381-382页; 江桦: 《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6170b010089k8_hm1; 邹振环: 《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羨的〈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 抽样本。

一、菲律宾的早期中文刻本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扩张是伴随着天主教的扩展一起展开的,当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西方五大传教修会也纷纷来到了菲律宾。^①西班牙人为确保其自身在菲律宾的利益,将中国移居菲律宾的华侨作为其宗教活动的重要对象,为吸收华侨入教,西班牙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信教华侨可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对不信教的华侨尽量加以驱赶,等等。^[1]根据多明我会的有关档案,“从1618年至1619年,共有155名男性受洗,……1621年5月14日至同年9月共有100名男性受洗……从1618年至1628年的10年间,共有1330名华侨在八连的三圣堂受洗。”^[2]

面对这样多的华侨教民和移居到菲律宾生活的中国侨民,用中文向他们传教就自然成为当时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传教手段和方法。在菲律宾的4本中文刻本都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

中国学术界最早开始注意到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的中文刻本是从方豪先生的研究开始的。他在《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一文中初步研究了他195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所发现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文后同时刊出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924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1605年的中文刻本 *Doctrina Christiana* 以及1911年赖达纳(W. E. Retana)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1606年在马尼拉出版的中文刻本 *Memorial de la via christiana* 即《新刊僚氏正教便览》。同时方豪还公布了他1957年在莱顿汉学院所发现的1607年在马尼拉刊印的中文刻本的残本 *Si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3]接着,方豪在他的《明万历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一文中对在菲律宾的早期4个中文刻本又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以后,方豪又在《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定稿》中分别发表了《明末马尼拉华侨教会之特殊用语与习俗——新刊僚氏正教便览与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 两书之综合研究》和《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吕宋明刻〈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之研究》3篇文章。^[4]

大陆学者戚志芬在《文献》中曾以《中非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为题对菲律宾早期中文刻本做了研究。^[5]而潘吉星在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张秀民在其《中国印刷史》中将在菲律宾共出版的4种中文书籍全部列出^[6],即:《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新刊僚氏正教便览》《新刊格物穷理便览》^②、《天主教义》^[7]。

然而,对菲律宾早期汉文书籍的出版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第一,道明会传教士在菲律宾传教中中文刻本的数量。

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道明会传教士在菲律宾传教中中文刻本有4本,但西方学者的看法并不和中国学者完全相同。美国学者柯维南(Coblin, W. South)在他整理出版道明会传教士万济国的《华语官话》的前言中说:“当多明我会士米格尔·贝纳维德斯(Miguel Benavides, 1550-1605)和胡安·柯伯先后于1587和1588年抵达马尼拉后,便被指派担任在菲律宾的宗教事物工作,并投身汉语学习。……贝纳维德斯是在菲律宾传教的第一个多明我会士,1593年成立了第一个印刷所,设在圣托马斯大学。那年刊印的第一批书,是两本解罪手册,用的是西班牙·他加禄语以及汉字,以中国传统的木刻法印刷。1602年引入活字印刷。……1588-1589年间,贝纳维德斯在马尼拉的圣加夫列编写了菲律宾第一部中文的教义问答,题为 *Catecismo de la Doctrina en caracteres chinos* (《中文基督教教义问答》见 Gonzalez 1966 383-384; *Oriental* 1895 7-8)”^[8] 根据我们所知,

①. 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 religious)、方济各会(Franciscan)、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耶稣会(Societas Iesu, S. J)、奥古斯丁重整会(Recollect)。

②. 由于方豪看到只是残本,所以没有给出这个书名。

伯希和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天主教义》出版时间是 1605 年,这样柯维南提出了一个由贝纳维德斯编写的更早的中文传教文本,显然,这已经超出了 4 个中文刻本的说法。西班牙的何塞·安东尼奥·希门尼斯 (Jose Antonio Cervera Jimenez) 认为:“多明戈·科罗纳德 (Fray Domingo Coronado, 1615-1665) 写了《盖天》(Tien Kai: Escala del cielo, ‘en el cual por el conocimiento de las creaturas se da conocer el Creador de todas ellas’, Gonzalez, JM. 1955-1967, vol. 5, p. 70)”。这是用中文写的书。盖天,是中国宇宙理论之一。这本书想借助自然使华人达到感知神的存在境界,这点与高母羡的《实录》一书有些相似。^[9]这个刻本过去也没有任何人研究过,只是在徐先生和周先生的译文发表后学术界才知道的。

如果柯维南和何塞·安东尼奥·希门尼斯两人说的是真实的,那么,原来中国学者所说的在菲律宾道明我会只出版了 4 本中文书的说法就要重新考虑。

第二,关于在菲律宾出版的中文书籍的刻工问题。

陈台民在《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一书中没有明确指出龚容的姓名,在谈到菲律宾早期印刷事业时,他引用了早期来菲律宾的传教士的回忆:“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愉快的是墨西哥来了一位订书匠。他带了书,开了一所订书场,雇了一位愿意为他做工的生理人。^①生理人秘密地、不让他的主任知道地、观察后者订书;啊!还不到……(原书稿空白)……他便离开作业场,说他不愿再继续为他工作了,并且开了一家类似的作坊。我可以向陛下保证,他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工匠,并且逼使他的主任放弃营业,因为生理人兜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的手法极佳,因而不再需要西班牙工匠。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手头有一本拉丁文的 Nabarro 是他所订的;而依我评断,即使在 Sevilla 也不会订得更好。”^[10]在方豪、戚志芬的研究中对这些书籍的印刷者尚未明确^②,张秀民则一方面认为“约翰·维拉 (Juan de Vera) 是中国人天主教徒的教名,原来的华名已不可考,卒于 1603 年,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刻工。”同时,他也接受戚志芬的说法,认为“龚荣与德·维拉可能是同一个人。”^[11]潘吉星明确指出:“因此,该国的印刷是从龚容首开其端的。”^[12]潘吉星主要借用了外国学者的结论。菲律宾远东大学教授赛德 (Gregorio F. Zaide) 认为:“1593 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基督教义的书,一本为他加禄文本,另一为汉文本,都是在马尼拉由一位中国教徒龚容刻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个闻名的印刷工。”^[13]

江桦和邹振环^③和也很明确认为龚容是以上书籍的刻工,他在文中说:“虽然在中国还没发现关于龚容 (Juan de Vera) 的资料,但在菲律宾却有不少他的史料。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天主教教兼历史学家阿杜阿尔特 (Diego Aduarte, 1570-1637) 的“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inas Japon y China”一书,书中写道:“在这一个先称为 Binondo 后改为 Minondoc 的镇中,居住着许多可以作为生活楷模的中国人。胡安·德·维拉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去祈祷的男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引导家人和他一样的男人。每逢弥撒,他都参加。在出席教会这方面,他也非常有规则。因为他懂艺术,所以用悬挂物和图画把教堂装饰得更漂亮。他认为,通过印刷出版圣教和书籍,他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遂致力在这块土地上制造一台印刷机。在这里没有任何印刷机可供借监,也没有任何欧洲式印刷术(它与中国的印刷术迥然不同)可供他学习的情况下,他的虔诚意愿得到上帝的帮助。胡安·德·维拉不懈地、千方百计地全力以赴,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成为这群岛上的第一个印刷师。此对一个商人来说,能

①. 西班牙人早期称到菲律宾的中国华侨为生理人。

②. 戚志芬在文中说:“据此可以认为,龚容与胡安·德·维拉即一人,龚容受洗礼后,教名为胡安·德·维拉,但尚待进一步印证。”《文献》1988 年第 4 期,第 552 页。

③. 参阅邹振环“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羡〈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一文,感谢邹振环为我提供了他的论文。

够使他在商业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他从不贪财,而且毅然放弃他的利润,只选择为上帝服务,把圣灵传播给土著。……中国人的基督徒胡安·德·维拉在神甫布兰卡斯(Blancas de San Jose)的指导下工作,终于成为菲律宾活版印刷机的第一个制造者和半个发明者。”^①[14]

第三,关于在菲律宾出版的4本中文著作的原著者。

1《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作者是高母羨(P. Juan Cobo, 1546-1592),这点没有任何异议。关于高母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②,方豪先生认为这本中文著作出版于1593年。

2伯希和1924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天主教理》。这本书的外文原文是:“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es de la Orden de Santo Domingo Con licencia por Keng Yong China en el Pario de Manila”。按照原文在书上的位置,应该是“第一行是:“天主要理”,第二行是“中文版本”;第三行为“多明戈教会专在中国人群中牧灵工作的神甫编译”;第四行是“中国龚容奉命刻印”;第五行是“于马尼拉八连”。^[15]此书的出版时间是1607年。

中文的《天主教理》作者是谁?伯希和与方豪都没有给出回答,江桦的文章也没有给出作者,施雪琴在《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中认为:“多明我会传教士为菲岛华侨的皈依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特别是该会的科伯神父(Fr. Juan Cobo),不仅努力学习并掌握了中文^③,而且还负责编写出版了菲岛历史上第一部中文版的《天主教教义》为适应菲律宾华侨社会闽南人居住多的状况,该书是用闽南方言土话音译西班牙语。”^[16]笔者的研究生蒋薇在其论文中也指出这一点,她在论文说:“《基督要理》中文本,是针对马尼拉的中国基督徒而写。Doctrina Christiana封面上部刻有西班牙文曰: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es de la Orden de Santo Domingo……此书之作者,依P. Aduarte著《菲日华玫瑰省道明会史》所言,应为高母羨(Juan Cobo)。”^[17]

3《新刊僚氏正教便览》。赖达纳(W. E. Retana)1911年在马德理出版的《菲律宾出版史》(Origenes de la imprenta filipina)中提出,道明会在菲律宾的传教士P. Fr. Domingo denieba在菲律宾的Cra Sangle华侨书店出版了《新刊格物穷理便览》(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iana, Ed lengua china compuetto por el Peder Fr. Domingo de Nieba. Prior lel conunto de S. Domingo. con licencia en Binondoc ed case de Petio de Vera. S gley Impreser de Libros. Ano de 1606)。潘吉星先生将其翻译成中文为“天主教义便览,由多明我会士多明戈·涅瓦神甫以汉文编成。由佩德拉·维拉(龚容之

①. Edwin Wolf^{2nd},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1593. A Facsimile of the Copy in the Lessing J Rosenwald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之英文摘译,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6119/16119-h/16119-h.htm>.

②. 参阅方豪:《从中国奠基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文化关系》,载《方豪六十自述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何塞·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撰:《西班牙神父在远东:高母羨及其著作〈实录〉》,载《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周振鹤、徐文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93页;Li, Dun(刘钝),“Western knowledge of geography reflected in Juan Cobo's Shilu《实录》(1593).”,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ortugal and the East II Macao October 11-12 1998, <http://www.ihns.ac.cn/members/li/doc/cobo.htm>;潘贝頔:《高母羨〈辩正教真传实录〉初步诠释》,载王晓朝、杨熙楠主编:《信仰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73页;Carls Quirino《无极天主正教真传之正辨考》,汪雁秋译,《大陆杂志》第26卷第8期;陈庆浩:《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明心宝鉴〉》,台北:《中外文学》第21卷第4期,1992年,第72-87页;刘莉美:《当西方遇见东方——从〈明心宝鉴〉两本西班牙黄金时期译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见与对话》,台北:《中外文学》第33卷第10期,2005年;郑阿财:《流行域外的明代通俗读物〈明心宝鉴〉初探》,台北:《法商学报》1991年第25期,第263-268页;潘贝頔:《高母羨与玫瑰省道明会传教方法研探》,《庆祝辅大创校70周年台湾天主教第二次开教14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1999年。

③. 施雪琴不知道“Juan Cobo”的汉文名为“高母羨”,所以这里用的是“科伯”。

弟)刊于鬻诺多克的萨格莱书铺。时间在1606年。”^[18]

4 《新刊格物穷理便览》是方豪最早在荷兰的莱顿汉学院读到一个残本,缺少前10页,因此,他在文中无法给出书名。^① 戚志芬在菲律宾见过此书的复制件,并初步描述了这本书的情况。她在文中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1607年,作者是‘山厨罗明教多麻氏’,即多明尼各教会的多马氏·马约尔。这是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的中译本。”^[19]

笔者手中有一本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复制本,该书的首页是西班牙文,内容是:

SMBLO DELA FE, ENLENGVA YLETRA CHINA. Compuefto por el Padre fray Thom as Mayor, de La orden de Saneto Domingo de la prouincia del Saneto Rofario, en las Islas Philippas

书封中央为道明会的会徽: Conlicencia en Binondoc en cafa de Pedro de vera China Chriftiano Año de 1607.

这本书共216页,后附3页当代西班牙文信件。书中每页9行,每行18字,四周双栏。从字体上看有两个刻工,全书的单页是一种字体,双页是一种字体,为便于刻书,书中多有简化字体。戚志芬在文中指出,这本书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也藏有一本。笔者也阅读过藏在耶稣会档案馆的这个版本,具体两个版本的对比研究待以后补充,这里不做展开。

二、《新编格物穷理便览》的基本内容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研究上,方豪在谈到这个本子时说:“在汉学研究院获见一残本,缺最前10页,我因第136正页第6行有‘今万历三十四年算至禹共有三千九百带一年,考订此书为1606年撰著。’^[20]他在张秀民书中提供了该书的首页,该书封面上有1607年7月的字样,从而纠正了方豪的误解,但张秀民并未对此书做进一步的展开。方豪后在《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一文中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书中的前3页是西班牙文的信件。

2 书封。书封上的中文是:山答罗曰此世上绝无余事物可欣我心,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实道居律氏记号而已。

书封的落款为:山厨罗明教院巴扎多麻氏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西士一千六百年七月日立。

在序言中,作者这样写道:“僧自我国受风波沥涉三载始到吕宋东夷,目击诸类人品,各循之见,以聚集此域。始知详暨现各形,各倍俱风采,佯卫者也。然明白,汝中华人尤聪明,特达才貌,恢伟胜于方外之类者也。亦尤晓礼义廉耻于别等之徒。但现此国土番若于中华人而相较论者,则相去远矣。盖东夷之国实则亦是人物,然以礼仪风俗难以比于中华人物。谅日本之人物尤胜于土番之风俗,礼仪第末可与汝中华者比也。唯汝中华之人胜于此类,此何可复加焉。予于去岁始到,此土与佛郎国遗界甚远,眼见诸众人品同致集此邦,岂不感动。予怀乎幸逢汝唐人聪明超类,而愈有感予衷耶!后幸与汝唐人交谈,辄习学唐话,颇谙音语,咀问中国原由,至日父(应为复)愈认愈真,亦问汝中国历代帝王所发政施仁者焉。自盘古至万历,历代守君之国用承相继,未尝休息,岂不堪叹之事!惟将寡我心心,俾予劳神殚思,欲以验汝中华人继夙愿,始曾知此一位无极天主之理否?予初看汝鉴断暨览,我佛郎国鉴录读多上事,曾了然明白道路可疑,汝中华更闻此理耶?因我读一本册,有曰:汝中国有一妇人之形像手抱其子,此乃我佛郎人称曰:山礁妈厄哑,甚尊敬他。汝等若读此一本册,便可知乃何形象也。又有人道,汝中国一形象三个头脑合为一头,此情诚将寡我心极。疑汝中华于昔者亦有撮遗。此佛郎人之主宰极理否?仍又一件甚启动我心,疑于古时金国灭尽鞑

① 参阅方豪《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一文。

人,即来占汝其国,时元帝等统管。汝中国八十九年先时,鞑人亦习天主教。仍有净水和尚等到彼鞑国海此天主教,鞑国人有一皇帝,名曰:高微勝柬,受此天主教,允做奇石实典儒。予读此书既毕,乃疑曰,假如那皇帝识习此道理,则士庶亦有多向顺于皇帝者,亦从此道焉。设汝唐人乃鞑帝之黎庶,自然谅有随执者亦有垂问者焉。特人虽有良知、良能之资,固为物欲所蔽,则自然昏昧而好事,必已忘记所言道理,诚非实然。如如瞽者不知见其路之直矣,光想为暗,光想为光;白称为黑,黑称为白,善心者反称为恶,恶心者反称为善,比如禽兽无有良知良能。皆真正本头之正理、正路能引人升天,为好。”^①

这里,我只则取了序言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菲律宾的道明会传教士的传教的特点。

3 《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的结构

全书的结构是:除序言外共有3卷,第一卷,是“事理”,作者介绍了天主教的5件事理,作者从人兽之别讲起,先说明人和兽的不同,接着讲人的特点。作者在介绍人的特点时将西方的人体生理知识介绍给了菲律宾的华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的五官和结构。由人的介绍就引出了对天主的介绍,实际上开始讲人神关系,说明天主的神力、地位。同时还特别介绍了天主神学中最神秘的三位一体的道理。这一卷的最后又开始讲天体,因为,这是天主所居住之处,作者从风,从火,从水讲起,逐步开始介绍托勒密的九重天的理论。这样我们看到,第一卷实际上是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理论的简化版。其逻辑是从人与自然讲起,讲人,进而进入中心——人神关系,最后是天主教的宇宙观。表面上是在讲自然,无论是动物、人还是宇宙,但核心是通过讲述自然来说明天主和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从叙事角度看,道明会的神父们这样的叙事方法对一般没有任何神学背景的华侨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第二卷是“解始祖人元历代鉴记”,这一卷实际上是对《旧约》和《新约》的粗略介绍,前面几节分别介绍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等内容,将《旧约》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按照中国纪年的形式很简单的勾勒出了一个天主教的纪年大事记。其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做了批评,他说:“此事予亦尝观汝中国通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民无所安息,群臣举鲧治水,鲧方命被殛。及舜摄政,举鲧之子名禹,使继父业。禹伤父治水无功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及疏九河,然后水害皆息,此事多虚少实。但予真知于尧时,洪水为灾,泛滥天下,止有一年,非若汝鉴中。道有百余年,洪水乃息。彼洪水为害,乃天主惩罚,溺尽天下人物,止存儒挨^②一家八口而已。据汝鉴中说洪水为灾,泛滥于天下,民无所安。此泛滥之说,岂小小之害而已?……又说禹疏九河,称其治水之功。论禹亦人耳,岂自力之能如是乎?……予真知非禹之功绩,乃天主行水灾,惩恶既完,一年间,天主命水去地,使地燥水,俾儒挨及三子得以安息。”

从第三节开始,介绍《新约》的内容,“天下太平西士将出”,将玛竇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几章的内容缩略后,把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的神迹介绍了出来,从而使读者对新约的基本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

第三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向中国的华侨介绍天主教的“十诫”,由于“十诫”通俗易懂,易和中国伦理相接,作者在讲解时开始和中国文化逐步相接;这一卷的第二部分,直接就是比较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别、之通,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做了批评。

在这里作者表达的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完全和耶稣会不同。首先,作者批评了中国的狂妄自大,只知中华而不知天下,以中华为天下,狭隘自足。作者说:“予闻汝中华辖广盛国,但四方诸国,有甚于中华者,亦有之;而人物尤高明、事理有端者,亦有之。吾未见四方同宗中华之道为天下正道,

①. 以上译文由宵箫从西班牙原文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②. 这里的儒挨即现代《圣经》中所说的“诺亚”。

咸称天皇之祖为普世之人祖。……汝必应我曰：‘有一国，自有一太祖，与天齐出以御民，但他不知三纲五常，如我中华之善俗。’予辨曰：‘此事乃骄傲之罪魁，虚诞之根本，耳所怨闻者。何则？况天下之广土，有土则有人，如中华之士，自谓若是其大乎？汝中华之人乃为正人而已。予曰：非也。此乃无知乳臭之戏言耳。若胜德高明之士，则不有是言也。或有愚昧不知正理，从恶鬼之傲志，而持一偏之鄙见者，恐有是言也。予今不欲汝多辨，亦不指我之远国，谨一年之水陆，无使汝之警异……。’”

接着，作者批评了佛教，认为佛教是“魔鬼张计，惑世诬民诳君之信”。接着又批评了在闽南很流行的妈祖信仰，认为妈祖不过是“人间之女流也，何有此大力乎？”。随后，他又批评了中国民众的观音信仰。作者在最后劝告在菲律宾的华人“汝华人聪明睿智，知闻一知十，凡诸仙佛及流信之余，皆非正理，诚乃魔鬼瞒人耳目。”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道明会在菲律宾传教和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境遇，道明会在菲律宾是当权者，他们西班牙人已经占领了菲律宾，他们完全不必掩饰自己的真实认识，从而对中国文化按说三道四，加以批评是很正常的。这种批评既有西方人的傲慢，也有击中中国思想观念狭隘的一面。而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为获得传教权，他们完全不敢这样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

三、《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的术语

由于在菲律宾出版的这些中文刻本是用闽南话来翻译的，因此，在对《圣经》和西方文化的翻译上有许多特殊的汉语术语，这些术语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圣经》在东方的翻译史仍是有价值的。这本书的宗教术语是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但翻译成中文时又用的是闽南话，从而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天主教术语，以及当时耶稣会所翻译的术语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根据方豪先生的一些研究和自己的体会将其做个简单的整理。

“天主”——译为“僚氏”——Dios “耶稣”——译为“西奇士”——Jesús “基督”——译为“厘实道”——Cristo “十字架”——译为“居律氏”——Cruz “圣十字”——译为“山礁居律氏”——Santa Cruz “圣神”——译为“卑厘厨山厨”——Espiritu Santo “耶稣基利斯督”——译为“西士奇尼宝道”——Cristo “圣”——山礁（先礁）——Santa “玛利亚”——译为“妈厘哑”——Maria “圣保罗、保罗”——译为“山答罗”——Pablo “圣人”——译为“山厨氏”—— Santos

《新刊格物穷理便览》的首页是：“山答罗曰此世上绝无余事物可欣我心，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实道居律氏记号而已。”

根据我们上面看到的词汇，这句话就是：“保罗说，世上没有任何可以宽心之事，唯有吾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标志而已。”

书封的落款为：山厨罗明教院巴扎多麻氏新刊格物穷理便览。这句话的意思是：圣道明会院神父多玛氏著《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关于菲律宾早期中文刻本的术语问题，方豪先生已经有文章详细论述^①，但系统的整理这些术语，并和耶稣会在华传教术语的对照研究仍有待时日。

注释：

[1][2][16] 施雪琴：《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1565-1898）》，厦门大学出版

①. 参阅《方豪六十四自选待定稿》。

社, 2007年, 第 95- 102, 101, 102页。

- [3] [20]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 1487- 1517, 1521页。
- [4] 方豪:《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第 437- 453, 455- 470, 471- 485页。
- [5] [19] 戚志芬:《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文献》1988年第 4期,第 544- 556, 555页。
- [6]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671, 699页。
- [7] [18]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419- 423, 421页。
- [8] 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姚小平、马又清译,外研社,2003年,第 32页。
- [9] 多明戈·科罗纳德:《西班牙神父在远东:高母羨及其著作〈实录〉》,周振鹤、徐文堪译,载黄时鉴主编:《东西文化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 381- 382页。
- [10] 陈台民:《中非关系与菲律宾华侨》,香港朝阳出版社,1985年,第 250页。
- [1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671, 699页。
- [12]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420页。
- [13] Zaide G,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Madrid, 1939, p388, 转引自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420页。
- [14] [15] 江桦:《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6170b010089k8.html
- [17] 蒋薇:《1592年高母羨(Fr. Juan Cobo)出使日本之行再议》,抽样本。

[责任编辑:司 韦]

**Further Studies on Early Chinese Book in Philippine Islands
on *Xin Bian Ge Wu Qiong Li Bian Lan***

ZHANG Xi pi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f Overseas Sinolog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four early Chinese books printed after Spanish occupied Philippine Islands this article further dwells on one of early Chinese books *Xin Bian Ge Wu Qiong Li Bian Lan* about its structures, authorship, publication and terms etc. The attached is a document translated from appendix of the book in Spanish.

Key word Philippine Chinese books; Spanish missionary in China